

1910

东莞文史

第二十一辑



东 莞 文 史

*

第二十一辑

(一九九三年一月)

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东莞文史》编辑部编

东莞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90千字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93粤准印证字第85号

东莞文史

吴南生题



目 录

陈健革命生平	何锦洲 (1)
海湾·沼泽·埔田	袁伟民 (22)
蒋光鼎曲江轶事数则	陈荫余 (34)
一九五九年东江决堤	朱 善 (37)
东莞县立中学史略	杨宝霖整理 (40)
邓尔雅其人其诗	杨宝霖 (48)
女儿香今昔谈	杨宝霖 (66)
谢荅臣的《生春草堂吟草》	谢创志 (77)
道家山忆旧	罗 菁 (84)
黄堂第杂谈	罗 菁 (90)
为争租东莞明伦堂储备仓田的	

一桩历史惨案	叶振铨整理 (98)
--------------	------------

文史点滴

中华毛蟹落户江珠口	朱 善 (101)
拳拳爱国心 缕缕故乡情	张励坚 张磊 (102)
旅越华裔罗允正烈士	袁振鸣 (104)
《东莞诗录》选 (第十五、十六、十七卷)	(105)
编后话	(144)

陈健革命生平^①

何锦洲

陈健（1911. 6. 24—1984. 11. 26）又名陈璜璜、赵千山、陈汝森、陈同，广东省东莞县城人。1920—1925年在东莞县城读私塾。1926年到香港油麻地联爱英文学校读书。当时，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已爆发。他参加反帝斗争活动。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1929年先后在香港油麻地华仁分校、英华书院读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团组织因多次被反动派破坏而暂时停止活动。虽然如此，他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组织进步同学，建立秘密读书会，在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1月，他到广州国民大学读书，在校内发起组织国际问题研究会，并写了《缘起》，请何干之（当时名谭秀峰）教授修改。该会因思想不同，对国际问题各持己见，首次会议后即停止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到中山、顺德、新会、恩平、台山等地城镇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提出要以革命战争战胜侵略战争，以“战争结束战争”。^②

在学期间，他曾阅读《大众哲学》、《反杜林论》、香港《大众日报》等进步书报，并接受何干之及其介绍的读书小组的指导，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那时，何干之

讲授社会学和中国经济问题两个课程。他公开讲授历史唯物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分析、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陈健听后，深受教育。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后，何干之离开广州。临别时，何干之告诉陈健，今后要开展独立活动。陈健随即联系二十余人，建立由他领导的“正路社”，出版手抄的内部刊物，翻印上海的《少年真理报》，传阅革命书籍，开展秘密活动。参加该社的有大、中学生和小学教师。1935年8月23日，即第三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到东莞厚街乡神仙水庙附近的一个大山上开会，陈健报告该社工作。会上，他和大家通过了主张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和下半年活动计划，并低声欢呼拥护第三国际。会议在晚上举行，每人都在会上作一个报告。他对每个报告都给以分析，肯定优点，提出今后努力方向。该社有一个中心小组，以陈健为组长，组员有张寿南（即温焯华^③）、张定邦二人。

1935年夏，曾在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的王均予到广州，通过黄兆贞的介绍，与陈健取得联系。王均予在广州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常与“正路社”来往。

“正路社”后来经陈健说服同中国青年联盟合并。部分盟员成立中国青年同盟东莞分盟。

那时，陈健也是中国青年同盟骨干之一。在此期间，东莞中学张如、王士钊等进步学生建立读书会，研究革命和时事问题，油印了《农村战线》，并将其装订成小册子，邮寄到各学校、团体。陈健在广州收到这本小册子后，立即返东莞找张如，说明当前形势和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这本小册子无论在内容和做法上都是“左”倾幼稚的。他还介绍了中国青年同

盟负责人王均予和张如认识。④

1935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使我国陷于严重的民族危机。陈健回到东莞参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并是该盟领导人之一。同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个爱国运动向全国迅猛发展。广州中山大学等校学生举行一二·一六”反帝示威大游行。中国青年同盟东莞分盟、陈健参与领导的反帝大同盟、袁教民领导的读书会，也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号召，团结东莞中学师生四百多人，于12月16日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他们在莞城大街沿途高呼“反对‘何梅协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掀起了东莞反帝爱国热潮。⑤

1935年9月，陈健到日本东京中央大学研究院学习，与革命同志蒲风、蔡冷枫取得联系，并旋即参加和领导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联盟（简称“语联”）活动。他懂英语，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成功，后成为留东学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主办拉丁化新文字讲习班，介绍和讲授有关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林林在东京主办的《留东新闻》曾称他为世界语学者。他经常同林为梁（林基路）、杜鲁人（何干之）联系和向他们汇报工作，并经他们介绍，于是年11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⑥在党的领导下，他与丁克等建立“世界语学会”、“新文字学会”，并举办世界语讲座，吸收留学生参加学习，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我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翌年春，何干之回上海。他便经常与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联系，在社会科学界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夏，

陈洪潮回国，陈健接任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组织委员。随后，官亦民回上海，梁威林接任支部宣传委员。陈健与林基路、梁威林等带领我国留日学生开展进步文化运动，把分散的自发的文化活动统一起来，从而使“左联”开创的东京革命文化运动得以进一步发展。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继续出版“左联”主办的文艺报刊，出版文艺理论杂志《文艺科学》，建立各种读书会，召开座谈会，吸引留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特别是加强对革命团体“文化座谈会”的领导，使参加成员增至一百多人。他们回国后，有些成为党的干部或学术理论界的骨干。中共东京支部还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社会科学党团、妇女党团。支部还建立“留东妇女会”、“广东同乡会”等革命统一战线组织，⑦团结广大留日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36年8月，党支部派陈健到上海向上海文委负责人周扬请示工作。适周扬不在上海，要一个月才回来。十月，陈健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经过五个交通站的转折，在法租界霞飞路见到周扬。陈健向周扬请示对“左联”解散后工作的意见。周扬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说凡东京支部吸收的党员都承认其党籍，回国后可经上海文委转组织关系等。周扬将一份小字抄写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陈健带回东京支部传达，并嘱咐先将文件默读记熟，遇到特殊情况即行烧毁。陈健坐船到神户时，遇日本严密检查，迅即烧毁文件。到东京后，他将文件主要内容默写出来，交同志们传阅。

1937年春，林路准备回上海。陈健接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继续与梁威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并支持成立“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团结同学，进行革命活动。林基路回国前，“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于这一年二月十四日下午到日华学会准备召开成立大会，东京支部发动了二百多同学参加。但少数国民党分子另想建立“中华留日同学会”。“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劝告他们应团结合作。可是，他们不听劝告，竟殴打进步学生推举出来的大会主席卓如，引起一场武斗。进步学生把少数国民党分子及受蒙蔽者二、三十人赶出会场。全体进步学生在林基路率领下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请愿，当初手挽手列队前进，后经日本警察干涉，改乘出租汽车前往。全体同学推举卓如、林基路为代表，提出惩办打人凶手，承认“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为我国留学生的统一合法组织等项要求。请愿斗争到深夜，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梁威林回上海。陈健继续留在东京主持支部工作。7月底，他接上海党组织秘密指示，命令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坚持到最后一批才撤退。为此，他和邝启常以及外围组织群众如杨克毅、潘沃权等十几人至8月13日才到神户上船准备回上海。但上海“八一三”炮声阻止了他们所乘法国邮船的旅程。全船二、三百名留学生逗留在神户约一星期，然后改乘英国货船赴香港。那时，中国留日学生约有三千人。东京支部组织的“哲学讲座”、“文化座谈会”、“世界语学会”等团体，团结了几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五百余人，成为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共东京支部党员最多时二十五名，入党条件很严格。后来，绝大多数党员回国。留日学生回国后不少成为共产党员。留日学生1936年回国前，东京有“左联”、

“语联”组织。

1937年9月，陈健回到广州，立即与前东京“文化座谈会”七、八名骨干（共产党员和入党对象）在惠福西路温良里租了一层房子，与邝启常、刘向东、杨克毅、邓健今、刘云等同食同住。他们一方面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并定期结合当时形势进行讨论研究；另一方面创办了《武装》杂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纲领、政策。与此同时，陈健还和上述几位同志在广州建立“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在文明路原“留东同学会”会址前座办公，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请云广英讲课。稍后，陈健和邝启常又介绍了几个留日学生入党，扩大党组织，并与中共广州市委联系，开展革命活动。这时，梁成林从上海到广州，因未能与广东党发生关系，陈健请他再赴上海与党组织联系。上海党组织通过延安转告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与陈健等联系。陈健和梁成林立即到香港见张文彬，正式接上党组织关系。根据广东省委指示，东京支部合并到中共广州市委。陈健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干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广州。陈健按照党组织通知，暂时疏散，听候通知才回广州。为此，他疏散回东莞县城。一个星期后，他返广州，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干事。那时，他曾参加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根据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罗范群的指示，主办广州市委党员干部训练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中央、省委指示武装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这一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陈健和云广英、黄文杰等撤出广州，经翁源到达韶关。11月，陈健任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与云广英等同志一起工作，办公地址设在河西安园。他曾到过衡阳，向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李涛同志汇报广东工作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他还两次到桂林，向李克农同志汇报工作。这时，他还与古大存、方方、区梦觉、尹林平等有过联系。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陈健受省委指派到闽西南向方方传达了省委有关反对反共逆流的指示。传达任务完成后，他重返韶关。当时，琼崖干部欧汉照到韶关，谈及琼崖已发展大批新党员，干部奇缺。陈健即向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负责人云广英提出要求，经省委批准到海南工作。

1940年1月，陈健到海南岛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琼崖特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抗日新闻》社社长，与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林李明、组织部长王伯伦、统战部长黄魂、民运部长欧汉照一起工作。

1941年12月，他任中共琼崖特委驻广州湾（湛江）联络代表，负责与中共南路特委、广东党组织和上级联系，整理及传达文件、指示，采办物资秘密运送海南，并负责海南与大陆之间的交通秘密联系。这期间，他虽身患严重肺病，但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2年，陈健的秘密身份仍是中共琼崖特委驻广州湾联络代表，公开职业则是广州湾赤坎晨光学校教导主任，化名陈汝森。该校是共产党员许乃超创办的，是一间进步学校。陈健曾以应该怎样做人为题对学生进行政

治教育。他说：“做人应该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他撰写了《晨光颂》词，全文是这样：“朝阳发亮，大地上，孩子们在歌唱。树影动，钟声响，学习读、写、算，接受新思想。爱光、爱亮，大家一齐向上。上操场，快成长，长大做个好榜样。晨光、晨光、晨光，光芒千万丈！”他把词交给音乐教师何绍煌谱写成校歌，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争取进步。他与该校校长廖晃欣团结合作，共同把该校办好，为祖国培养了大批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⑧

在晨光学校期间，陈健还对何绍煌说：“搞歌曲创作，要反映时代，更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象《义勇军进行曲》将是一首流传很久的歌曲。它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给人民以斗争的信念和勇气。虽然，这首歌今天在这里已经不能公开唱了，但将来人们还是要唱的。你能写一首象那样的又能公开唱的歌曲吗？”绍煌回答说：“我没有那个水平。”陈健说：“就象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那样，可以吗？”绍煌深受启发，于是写了一首《光明就在前头》的歌曲。陈健对歌词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歌词是这样：“哎呀咳！如山的巨浪又来啦，肩已酸，背已麻，黑云布满天下。一天天过去没休停，何时能见光明？舵要把紧，狂风快要吹尽，把我们的方向看准。破浪前进，横流已到退潮时候，光明就在前头。”这首意义深长的歌曲很快就在全校师生中唱开了，他们还在校内外文艺会演中演唱过。⑨

1943年春，陈健接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交通员张瑞民通知，中共粤北省委、粤南省委遭破坏，请中共琼崖特委、南路特委暂时不要找上级联系。陈健把这个通知

转告琼崖特委。他继续留在广州湾，仍以琼崖特委代表身份和南路特委保持组织关系。他经常与周楠、中共南路特委委员温焯华、杨克毅联系，开展工作。

1944年秋，林伯渠到重庆后，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党中央取得联系。琼崖特委指示陈健通过南路特委恢复同上级、党中央的联系。不久，设立在东江地区的中共广东省临委也有交通到广州湾，通过陈健同琼崖特委恢复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陈健离开广州湾，乘国光轮船赴香港。船到水东海面下沉。陈健冷静沉着跳下来营救的木船，幸免遇难。他随即改乘轮船经澳门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区委梁广、饶彰风取得联系，任广东党组织创办的《新华南》社总编辑，主办华南通讯社。1946年7月，东江纵队已北撤到山东烟台，《新华南》社暂时停办。陈健因患病也暂时治病休养，由尹林平、饶彰风指定住在黄作梅的伯父的别墅里，看守粉岭附近的一个机关。

1948年7月，陈健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机关报《正报》社社长，经常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汇报及请示工作，并与章汉夫、李嘉人、许涤新、杜桐等经常联系。他主编的《正报》发表了国内外，特别是华南的重要消息，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报导广东各地革命斗争动态，连载方方的长篇革命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以推动华南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了办好这份报纸，他花费了许多心血，并通过各种渠道，把它输送到闽粤赣边区、东江、粤北、粤中、西江、粤桂边区、琼崖等地。1948年底，香港分局决定《正报》停刊。同年12月，陈健任

香港分局农村工作组组员，在组长林李明领导下，与张森等一起工作。

香港分局于1949年春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林李明调到云南工作。农村工作组改称为军事组，陈健任组长，掌握华南敌我军事情况和研究有关游击战争问题，并经常向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同志汇报华南各地军事斗争概况。同年5月，陈健随华南分局机关由香港转移到闽粤赣边区的梅县，继续任分局军事组长。9月7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江西南部参与筹备赣州会议。⑩9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委员、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主持下，召开了赣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华南分局秘书部门负责人李嘉人、宋维静、陈健等。会议中心是讨论解放华南等问题。那时，华南分局负责领导广东、广西、闽粤赣、粤赣湘、粤桂、桂滇黔等地区党委。会议期间，陈健曾把分局领导范围内敌我军事情况向叶剑英等领导汇报。会议期间，他参加部署支前工作。

1949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以中共中央委员、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州市长叶剑英为书记、广州副市长朱光为副书记，陈健为组织部长。10月6日，陈健兼任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协助叶剑英、朱光同志做好接管广州工作。广州市委组织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调配好全市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广州解放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干部来自四面八方。除老解放区调来少数干部

外，大部分干部没有城市工作经验，干部思想复杂，实际问题不少。有些干部认为工作分配不合适，要求重新分配。他为了做好组织工作，夜以继日地看干部档案，找干部谈话，耐心与干部交谈，从不把困难推给别人。他经常教育组织部干部，要热情耐心接待来访的同志，对他们提出的困难，要尽力帮助解决，使干部一到组织部就象到了自己家门一样，感到组织部是干部的家。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同志既热情诚恳，又认真细致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同志们都乐意接近他。

陈健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处理是十分慎重和认真负责的，他曾对组织部同志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不能搞错一个干部。为此，组织部为干部做历史结论或为某个干部写历史证明时，从不含糊，坚持实事求是。^⑪

陈健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对自己要求是这样，对干部要求也是这样。他要求组织部门干部要有过硬本领，要熟悉业务；要求管档案的同志，做到对重要文件有多少，有哪些主要内容，都要心中有数，说得出来；要求管调配工作的干部，对被分配的干部的情况要熟悉，分配时要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愉快地接受任务。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陈健还组织全市党员学习党章，学习党史。他亲自讲课，内容丰富，有条理，使同志们受到深刻教育。

1950年11月，陈健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市委发出的重要文件，逐字逐句地斟酌，连标点符号也认真地校正。他还经常指导干部，写文件要注意标点符号。他说：一个党委的文件代表一个党委

的水平，市委发出的文件要有一定的水平，以表明共产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是有文化的。

解放初期，市委干部都集中在饭堂吃饭。为了使干部吃得好。陈健亲自过问食堂工作，关心群众生活。他还亲自抓市委机关俱乐部的建立，使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文娱晚会，以便干部能欢度周末。⑫他关心同志的婚姻，曾在家里，为市委组织部同志举行婚礼，使同志们很受感动。

陈健患肺病和支气管扩张病，病发时常常吐血。但他带病坚持工作，不住医院。同志们向他汇报广州市委组织部或市委秘书部门工作时，他逐一提出意见。吐血刚止，他又马上上班照常工作了。

1951年7月，陈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这一年秋冬至1952年5月，他率领中南局直属机关干部到江西省修水县参加土地改革。他兼任中共修水县委领导人，参与领导全县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广大贫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伟大革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怎样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前提下，使所有参加土地改革的同志都得到锻炼和提高，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到修水的这个工作团，大部分是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同志。他们虽然革命热情得高，但往往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工作方法简单急躁，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个别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怕别人说自己立场不稳，有宁左勿右的思想。陈健坚持党的政策，正确指导开展土地改革，耐心教育同志，使参加土改的同志，既完成土改的伟大任务，又得到锻炼和提高。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郑逢任就是经

过他的帮助后，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⑬

在修水县农村土地改革时，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在附近村庄占有土地最广，对农民的剥削也很多。但这个地主同时是医生，医术高明，在广大农村治愈了许多有病农民，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个别同志要求将这个地主划为全片重点诉苦斗争对象。陈健听后认为：此人虽是地主，占有土地和对农民剥削也较多；但民愤不大，且懂医术，是医生；广大群众今后治病仍需要他；医生在土地改革中是受党的政策保护的。因此，他和同志们研究后决定，这个医生兼地主不作为全片诉苦斗争对象。他坚持了党对医生的正确政策，受到大家的好评。对那些残酷压迫剥削农民、民愤很大的地主，他毫不含糊地支持农民开展诉苦斗争。例如有一个姓刘的地主，过去不仅残酷剥削压迫许多贫雇农，而且连贫雇农的十几岁少年、小孩也不放过。因此，在诉苦大会上，一个雇农的小孩也上台进行诉苦斗争。陈健同志在台下，用赞扬的口吻对土改工作队员郑逢任说：“这个少年斗得好，斗得有力，对地主的罪恶讲得具体，诉得有情，声泪俱下。你看台下的群众对这个少年都表示同情，对刘家地主则表现无比愤怒。”

陈健为了启发土改工作队员在土改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还对大家讲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有一些干部在土改中由于不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结果走了弯路，使土改成了“夹生饭”。这些事实，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他还对同志们说：贯彻党的政策，要注意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执行，在不离开党的奋斗目标和总政策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否则，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脱离群众，土地改革就搞不好。